

新亞研究所師友雜記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錢穆（1895-1900）先生在本港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早於中學時已有知聞。及至回台升學，就讀於師範大學（師大），時中國文化史一科，業師朱際鑑規定閱讀錢氏之《中國文化史導論》及《文化學大義》二書，並撰書評。對錢氏之學，由是有所認識而心領神會。1967年錢氏移居台北，講學中國文化大學，並出版《朱子新學案》一書，繼而發表《朱子學提綱》，轟動士林。遂得閱讀《提綱》一書，讀後猶如對中國學術思發展，獲一全面性鳥瞰的認識，留下深刻印象，故已有畢業後回港投考研究所之志。

回港後，得悉師大學長歐陽鎰豪於1971年先行考入研究所，繼而同班雷家驥亦於1972年考入，時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均設於農圃道，而新亞中學則尚未開辦。其時余於中學任教，課餘即至農圃道，與鎰豪、家驥共聚，並因而得識全師漢昇之助理李龍華，研究所1970年入學的廖伯源，及家驥同屆之梁國豪與劉楚華四位，並認識大學部歷史系四年級生陳懿行及何漢威二位。

龍華及漢威先後至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攻讀博士，余亦於稍後獲浸會停薪留職，並資助前赴澳大深造，得以重逢。時龍華已畢業，任職澳大遠東語文圖書館，而漢威則仍在學，時常往還。漢威記憶力驚人，中、西史學造詣至深，與其相交，獲益良多，其後畢業至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任職至今，為近代中國經濟史專家。

而伯源及楚華二位則至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攻讀博士，國豪則至京都大學深造，家驥返回台北，至中國文化大學攻讀博士，今則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以唐代史學研究著稱。伯源亦於法國畢業後，一度回所任教，現則任職於史語所，擅長漢代政治制度。而楚華亦稍後來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成為同事，並成古琴名家。

余於1973年為研究所錄取入史學組，同屆尚有陳懿行及戴桂冠兩位，而與同年入學的翟志成交往較多，志成於文革時為中山大學之紅衛兵，文筆犀利，深得所中師長之喜愛，其後至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隨杜維明攻讀博士學

位。1985年與他在國立星加坡大學重遇，志成任職於該校之東亞哲學研究所，該所為星加坡政府鼓吹儒學之學術機關，今已結束。日後轉而任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究心於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

余入學時，研究所尚隸屬於中文大學，至1974年由於研究所諸師與中大校長李卓敏之辦學及學術理念有所不同，故決定離開中大，自行獨立，並接受台灣教育部之資助，此研究所畢業生日後均能獲教育部頒授學位之由來。

其時研究所所長為唐師君毅，教務長為趙潛先生，所內共分文、史、哲、佛學四組。史學組導師為蘇師慶彬，任教中國史之老師，包括嚴耕望、全漢昇、王德昭、陳荆和、羅夢冊，孫國棟等數位。而余英時亦於此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皆一時之選。而研究所尤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師，為熊十力之弟子，最為著稱，新亞研究所亦因其三人而成為1949年後新儒家之學術重鎮。

史學組導師蘇慶彬原為魏晉南北朝史之專家，然其時開始從事編纂《清史稿》索引，並由同班戴桂冠協助。故研究所存有大量蘇師編纂索引之咭片，蔚為大觀。入學後，除需修讀英、日語文外，先後修讀耕望師、德昭師及復觀師三位任教之學科，而論文導師則由孫師國棟指導。諸師皆學問淵博，獲益匪淺。余於師大攻讀時，其初研究興趣在於近代史，而師大亦以此著稱，後受師朱際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之影響，故亦對中古史多所用心，故入研究所後即修讀耕望師任教之科目——中古史研究及中國歷史地理兩科，所受教益最多，故先談耕望師。

耕望師為賓四先生國內任教時之弟子，獲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著稱，並已自闢歷史地理研究之蹊徑。所講授中古史一科，上學期主要介紹中古史史料、治學方法及其生平所遇師友之學行，日後並將其課堂所講，擴充而成為《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賓四先生與我》三本小書，實為治中國史入門的最佳讀物，耕望師之專史研究，實屬藏之名山之專門著述，讀之者少，知之者亦希矣。惟獨此三本小書，使其為史學界人所共知。而下學期則以其撰寫有關政治制度及歷史地理之專題論文，抽取若干篇講解其研究來由及心得。耕望師之史學，奠基於史料，故其研究創獲之光輝皆由史料而得。曾於課堂上自謂其歷年研究唐代交通路線後，最終發現了唐代的國界，此為其於唐史研究之發明，由此可見，耕望師史學研究之精細及真相發明之功力。

至於中國歷史地理一科為大學部之科目，然所修學生不多，蓋因耕望師之普通話，不易為香港學生所聽懂。當時一齊上課，尚有今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蘇基朗，基朗於中大畢業後，亦至澳洲國立大學進修博士，以研究宋元泉州及法律史著稱。耕望師所講歷史地理，起自史前，下迄唐宋，對疆域、氣候、物產、交通、城市，多所論述，余修此科，國史造詣由是大進。

余隨耕望師研習時，得以相知，一度邀余隨其研究中古之四川。然由於任教中學，工作量甚大，難以靜心細讀中古史料，故最後仍選取近代史作為碩士論文題目，至未能成為耕望師之入室弟子。然而研究所期間，受其教益最多，對於耕望師治史之學行品格，終生不忘，其所主張「讀人人能讀之書，講人人不能講之說話」，以及「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至今尤奉為個人治史、處世之圭臬。

此外，在中古史一科，同班尚有屈啓秋及劉福注兩位，皆中大歷史系 1973 年畢業生。該年畢業生除前曾提及相識之陳懿行、何漢威外，日後浸會歷史系同事周佳榮及鮑紹霖兩位均為同屆。啓秋現為新亞中學校長。故余與中大歷史系 73 屆最具緣份。不但先後成為同學、同事，亦多為好友。

德昭師早年任教師大之西洋史，並出版《國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一書，早已著稱於台灣史學界。余在師大之受業諸師如王爾敏、呂實強、王家儉、李國祁、李恩涵等，均曾受教於德昭師，故早已知其大名，德昭師後至南洋大學任教，再至中大，並出任文學院院長。時開「中國近代思想史」一科，以中國近代史上之改革及革命家思想作為講述內容，始於清中葉龔自珍而迄於五四之陳獨秀及李大釗，德昭師出身北大，留學哈佛，學兼中西，且口才卓越，聽其講課，娓娓道出，論述精彩，實為學思上之享受。德昭師時因章士釗病逝香港，參與扶靈，而被視為右派中之“變節”者，此冷戰時代，左右對立意識形態所導致。由於新亞研究所與台灣國府關係密切，故德昭師與研究所之關係未能維持。余本擬隨其撰寫碩士論文，終因此而未能成功。

德昭師於中大研究院時，先後指導林啓彥、陳萬雄及周佳榮三位，後皆至日本廣島大學留學。佳榮、啓彥二位日後均來浸會任教，獨萬雄至商務印書館任職，而今成為出版界名人。由於皆曾受教於德昭師，而德昭師晚年致力於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故我們皆先後受其影響，從事辛亥革命史之研究，此亦

80年代浸大歷史系以此作為起家之研究課題。

德昭師於中文大學退休後，本擬專心著述，可惜不久即因腦溢血而去世，未能在史學研究及著述上留下更多成果，至為可惜。其臨終前一年，曾至浸大歷史系演講，時系主任劉家駒先生（研究所第6屆畢業）於演講前致辭，謂德昭師為本系老師之老師，德昭師頗為快慰，演講後並同至尖沙咀「鹿鳴春」京菜館午膳。該餐館為60至70年代新亞及香港學術文化界常至聚餐之地。師生至為言歡，然德昭師卻不久即行逝世，未竟其業。

復觀師被尊為當代新儒學大師，著作等身，然尤擅長撰寫政論文字，文字氣勢磅礴，《突破雜誌》故創刊人及主編蘇恩佩曾面告余，謂復觀師為香港撰寫時論之高手，中文尤佳絕。復觀師受聘於研究所後，講授《史記》及《文心雕龍》兩科，至為叫座。其後新開《漢書》，余即選讀，然講至〈后妃傳〉，因江青與四人幫專擅，話題一轉，竟然談論中共政治，直至學期結束。故該科實為漢書與當代中國政論合講，由於復觀師曾與中共領袖接觸，講論時栩栩如生，如見其人。復觀師於東海大學任教時弟子蕭欣義為其編刊文錄，其中一冊為《論中共》，即復觀師於堂上所講論者。

復觀師熱愛中國學術與文化，對儒家思想終將開拓中國民主，倡論尤多，一次研究所師生同遊青山，復觀師侃侃而談儒家民本思想終將使中國與西方民主接軌，時余年少，起而論說，並謂中國政治文化中始終欠缺希臘城邦的民主投票及罷免制度，不易成事，致使復觀師頗為不悅。然復觀師對於傳統儒家思想的持守及更新之願望，至今尤在余中心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處於廿一世紀的今天，所謂“全球化”而實為“西化”的華人學術界及社會中，益增對復觀師思念之情。

國棟師為余在研究所之論文導師，其初本擬隨德昭師撰寫論文，然因上述因素，君毅師代為安排由國棟師指導。國棟師為唐史專家，亦為本港華文史學界首先以計量方法研究唐宋之政治及社會史之學者，其《唐宋史論叢》一書，可見其研究之功力。國棟師時為新亞歷史系主任，行政工作十分忙碌，兼且余又研究清代福州城市發展，與其研究領域不同，故給予相當自由，自行探索。然國棟師建議，須向全漢昇師請益，此即日後旁聽其中國近代經濟史一科之由來。全師講授該科，以其生平部份著述，建構出一本中國近代經濟史講義，講

書有條不紊、論述清晰，使余對明清經濟史上重要問題如絲銀貿易、米價、人口、新式工礦、交通企業獲得嶄新之知識，有助碩士論文之撰寫。及余論文完成，校內口試委員，即由孫、嚴、全三師主考，而由羅香林為校外考試委員。

研究所攻讀時，除上課、讀書、撰文外，尚有月會及於農圃道圓亭舉辦的中國文化講座演講會。其中最為難忘者乃曾出席兩次演講會。一為牟宗三師演講士在國史上之發展，牟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在兩小時的生動演說中，全面地勾勒出中國士階層的思想及其發展脈絡，令人折服。

另一則為余英時主講〈史學、史家與時代〉，余為其中一名記錄者。該演講始於說明蘭克（Leopold Von Ranke）之科學史學如何與清代乾嘉考證結合而形成當前考証史學的專題研究之風氣。繼而指出近日西方學術界對蘭克史學之反省而帶出史家、史學與時代具有密切關係，並指出當前我國史學界除注意專題的分析研究外，應投身撰寫通論的綜合研究，方能顯示史學「古為今用」之價值。余氏中西史學素養深厚，論述清晰而發人深省，演說辭日後刊登於《幼獅月刊》，並收入余氏《歷史與思想》一書。該文實為二十世紀我國新史學的重要文獻。

此外，尚有可一記者為研究所於開學禮時，例由君毅師率領全體師生，向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行三鞠躬禮。而每年春節諸生則必至研究所諸師家中拜年，藉以加深師生之感情，凡此種種皆可見研究所尊崇中國文化之精神意向。

50年代國變後研究所師生於殖民地共同致力於中國學問之情境，撰寫此文時，仍歷記在心頭。上列諸師雖或相繼離世，或已垂垂老矣，然新亞以民間學人發揚中國學術文化使薪火得以相傳，顯然已成為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共同記憶，也許這是中國民族與文化仍能更生恆常不容忽略之原因。